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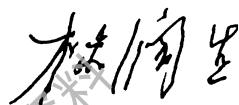
## 序

中国农村改革已近三十年了，从那以后，中国人民不再饿肚子，出现了农产品供给的极大丰富，及乡村工业在国民经济中获得支柱性地位等可喜局面。中国今日举凡一切经济成就，可以说都是奠定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的。

回顾农村改革的历程，包产到户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。它是政府与社会的一种“互动”的结果（详见《杜润生自述》）。不但需要仔细倾听农民的意见，而且针对领导层的不同意见也要进行回应，所以当时我们更多的是依靠说服的方法。1981年我曾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做报告，薄一波当即表示很好，认为说清了农民要包产到户，上面却要集体化这个反复多年的矛盾。程子华说，第一次听说农民包产到户已有了四次，如果再拒绝、打击，还会有第五次。这就看出对改革以前历史认知的重要性（即使农村现存的一些仍未解决的问题，也都具有其历史渊源）。

所以当我有机会回头来总结中国农村改革时，就把对改革以前历史（如五十到七十年代）的追溯放在了重要位置。我们发现，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作为，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，总要有办法，来对付、应付的。我认为，这些都应该找一找，不能把它当做消极的东西。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的演变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，经过双方“互动”，才实现了今天的农村改革。在这中间，农民的“抵抗”（这是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

议上的用语，用以形容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基本态度)，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。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。为此高王凌专门去做了农民“反行为”(counteraction)的调查。他经过十多年的调查研究，现在终于有了《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(1950-1980)》这本小书。我希望它能抛砖引玉，让更多的有识之士投入这一类的研究，与时俱进，解决好农村发展的种种问题。



杜润生

2006年9月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資料